

## 古明君：疫情中的中國國家治理與移動政治

採訪／李宛芝、林威辰 撰文／李宛芝

COVID-19為2020年帶來極大的衝擊，究竟在疫情蔓延的時代中，中國是如何治理國家？在此非常態時期，「人」、「物」與「資訊」的流動，呈現了怎樣的權力圖像？此次邀請來訪本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，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古明君副教授，分享疫情期間如何持續挖掘中國國家治理及移動的議題。



### 疫情時期的人、物及資訊流動

古明君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的文化政治，關注的議題包括中國民間信仰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國交流，在分析上向來會處理到各種人群或物質的流動。受到疫情影響，她執行中的科技部計畫「媽祖信仰跨海峽進香的移動政治」，無法如原定安排赴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。但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，古明君因本身研究興趣，持續大量閱讀中國各方面與疫情相關的社群媒體消息，緣此，引起她重新思考在中國的脈絡下治理與流動之關係。

流動，不僅是指人群的移動，還有物資運輸，以及因現代科技發達而產生的資訊交流。疫情期間，中國是透過何種空間手段管制人群的移動？在物資上，如口罩、醫療物資等運送及分配，如何進行？如何掌握與運用疫情相關的資訊流（疫情資訊與輿情）？皆是疫情期間浮現的，與流動有關的中國國家治理問題。

受益於移動研究的理論文獻，古明君從「移動的不均等分布」切入作為提問的起點。分析人口、物資、資訊流動中的不均等分布，以此掌握其中的階序與權力，也希望藉由對中國疫情期間的資料蒐集與分析，來理解中國政體在緊急狀況中，回應危機的國家能力、治理邏輯以及社會控制等現象。

目前的研究先處理了「人」的流動。她指出多數民主國家的防疫措施仰賴個人主體約束自我行為。例如臺灣推行的防疫新生活，或是歐美各國關閉公共空間，保持社交距離等，這些主要是透過個體的自我技術來遏制病毒傳染。相較之下，中國採取嚴厲的空間技術，從疫情爆發時的「封城」到其後的「封閉式管理」，是將人鎖定在特定區域，不得隨意移動，呈現的是前現代性質且具有戰爭寓意的空間技術。

人類為甚麼要移動？因為人必須靠移動來趨近其生存所需要的資源，也因此現代民主國家往往將遷徙視為人的基本權利。透過媒體資料，古明君看到：在封城令頒布初期，封鎖區內的人、物資及資訊的流動，反而越加劇烈，因為人們必須不斷奔走購買糧食、藥品、口罩等生存必要物資。直到後來疫情更加嚴峻，中國各地出現「封閉式管理」，封鎖緊縮到更小的尺度：社區，甚至是建築物的樓棟，相關資料中也呈現了此種管理模式造成的許多糾紛案例。

封城與封閉式管理，實施恰在春節期間。但假期結束後，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復工的難題，必須解除人口流動的封凍狀態，將勞動人口從農村移到工業地區。無法復工不僅會造成經濟下滑，更會進一步引發社會與政治不穩定。為了解決復工問題，各省分開始祭出各種手段，有推行復工專車、火車甚至是飛機，將勞工接到工廠所在地，後來更發展出「健康碼」個人電子通行證。

## 健康碼與碎裂的數位地景

「健康碼」是管制流動的數位科技。最先開發健康碼是在浙江杭州的餘杭區，該地不僅是企業聚集地，也是阿里巴巴集團總部所在地，同時是中國大力推行電子支付的地區。最初開發餘杭綠碼並發展為杭州健康碼，是希望運用數位技術解決因防疫造成的移動障礙，以個人健康資訊為風險分類判准，讓低風險勞動人口可以順利回到工作崗位。由於餘杭區的特殊地緣關係，地方政府願意釋放並整合各部門資料庫，開發健康碼是地方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協力之作。

健康碼呈現出中國「數位威權主義」的樣貌，是值得深思的議題。目前對於數位威權主義的理解，主要認為：政府透過科技將所有資訊數位化，一方面使人民生活變得更加方便，但與此同時，政府也更嚴密的控制人民的言行舉止，一旦發現對政府發出異音，就會因此失去所有的權利。但古明君目前的研究注意到：以健康碼來看，各地的開發歷程不一、不同地方政府的數位能力也有落差，即便中央政府試圖在各省分推行全國統一的健康碼系統，但實際的情況是各地的數位技術發展過程多重又碎裂，整合非常有限，這造成了碎裂化的數位地景：移動的人口因為不清楚各地的當地狀況，無法順利接收到資訊，或是移動者身上得準備好幾種不同的健康碼，運用在不同的場合（長程運輸、當地公共交通、進入工作場所等），全國一碼通行很難達成。此外，健康碼實施之後，移動管制仍然並非僅僅關於數據資訊的科技運用，特定的身分標記還是人群分類的重要依據。武漢因為是疫情起源地，來自武漢的人，即使持綠碼移動，仍會因為來自武漢遭到其他地區的人歧視，甚至不讓通行。

古明君指出：封城，封閉式管理、與健康碼實施呈現的移動不均等分布，可以用移動研究提出的「摩擦」概念來理解。此處指的摩擦並非物理現象，而是具有社會性質的阻力。國家在不同人口上放置不同的摩擦係數，作為一種控制流動以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。特定身分的磨擦係數極大，例如封城下武漢城內的人，導致他們的移動遭到巨大阻力，只能困在特定地區。但是，封城並非「不進不出」，實際上還是有特定人群可以進出其中。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紅色志願者（志願協助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擔任各式職務的人員，如志願到醫院擔任護士），不僅摩擦係數小，政府甚至會提供推力，讓他們可以平滑的移動。

## 持續探索中國議題

目前這個研究的主要分析資料來自媒體報導與社群網路內容，接下來會積極尋找訪談對象，希望可以更為貼近當地移動經驗。個人具身的移動經驗，一方面展現國家的治理技術，一方面也可能呈現國家能力的限制。同時，古明君也提到，由於臺灣的疫情不嚴重，因此用臺灣的防疫角度去理解其他國家的防疫經驗是有限的。近期各國學者積極分享不同面向的COVID-19相關經驗研究，她認為在此時應該帶著比較視野，了解其他國家的不同狀況。作為中國研究的學者，古明君此次亦是運用比較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，藉此了解威權國家如何在重大災難來臨時進行治理，並從中國的防疫來談國家與社會的互動。她也提到，作為一個社會學者，閱讀社群媒體資料使她在無法親臨田野現場時目睹了正在發生的事，而分析資料和寫作，則是將自己當作轉譯者，將資料整理出清楚的理路後呈現，讓社會大眾能夠知曉，中國在疫情期間是如何治理國家。

在中國越加集權化、國安越加嚴格，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社群都越發難以進入中國做實證研究的狀況下，臺灣的學術社群已經是最靠近中國，而且具有能閱讀中文的優勢，也相對容易搜尋資料，可以說是中國研究的前沿。中國的現況是臺灣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，更應該積極開展研究。因此古明君不僅期許自己持續努力耕耘，也希望能有更多研究者可以更深入的探索中國治理的相關議題。

**「國內訪問學者」申請受理時間：每年1月、4月、7月、10月**

· 詳細資訊可參考：<http://www.hss.ntu.edu.tw/model.aspx?no=85>